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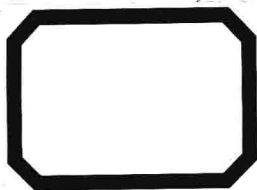


从传统到近代： 晚清浙江学术的转型

汪林茂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从传统到近代： 晚清浙江学术的转型

汪林茂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从传统到近代：晚清浙江学术的转型 / 汪林茂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3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

ISBN 978 - 7 - 5004 - 9574 - 1

I. ①从… II. ①汪… III. ①学术思想 - 思想史 - 研究 -
浙江省 - 清后期 IV. ①B249. 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40863 号

责任编辑 官京蕾
特约编辑 李 鸣
责任校对 王兰馨
封面设计 弓禾碧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7

插 页 2

字 数 453 千字

定 价 4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浙江省文化研究工程指导委员会

主任：赵洪祝

副主任：夏宝龙 王国平 巴音朝鲁 李 强

黄坤明 郑继伟 张 曦

成 员：胡庆国 马林云 陈一新 胡 坚

金兴盛 刘希平 钱巨炎 乐益民

杨建新 钟桂松 陈 荣 林吕建

郑仓元 童 健 胡祖光 梅新林

许 江 邵占维 张金如 陈德荣

孙文友 徐止平 孙建国 梁黎明

张鸿铭 陈荣高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总序



有人将文化比作一条来自老祖宗而又流向未来的河，这是说文化的传统，通过纵向传承和横向传递，生生不息地影响和引领着人们的生存与发展；有人说文化是人类的思想、智慧、信仰、情感和生活的载体、方式和方法，这是将文化作为人们代代相传的生活方式的整体。我们说，文化为群体生活提供规范、方式与环境，文化通过传承为社会进步发挥基础作用，文化会促进或制约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文化的力量，已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

在人类文化演化的进程中，各种文化都在其内部生成众多的元素、层次与类型，由此决定了文化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来源于其内部生成的多姿多彩；中国文化的历久弥新，取决于其变迁过程中各种元素、层次、类型在内容和结构上通过碰撞、解构、融合而产生的革故鼎新的强大动力。

中国土地广袤、疆域辽阔，不同区域间因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建构了不同的区域文化。区域文化如同百川归海，共同汇聚成中国文化的大传统，这种大传统如同春风化雨，渗透于各种区域文化之中。在这个过程中，区域文化如同清溪山泉潺潺不息，在中国文化的共同价值取向下，以自己的独特个性支撑着、引领着本地经济社会的发展。

从区域文化入手，对一地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展开全面、系统、扎实、有序的研究，一方面，可以借此梳理和弘扬当地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资源，繁荣和丰富当代的先进文化建设活动，规划和指导未来的文化发展蓝图，增强文化软实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舆论力量；另一方

面，这也是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研究中国文化、发展中国文化、创新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如今，区域文化研究日益受到各地重视，成为我国文化研究走向深入的一个重要标志。我们今天实施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其目的和意义也在于此。

千百年来，浙江人民积淀和传承了一个底蕴深厚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的独特性，正在于它令人惊叹的富于创造力的智慧和力量。

浙江文化中富于创造力的基因，早早地出现在其历史的源头。在浙江新石器时代最为著名的跨湖桥、河姆渡、马家浜和良渚的考古文化中，浙江先民们都以不同凡响的作为，在中华民族的文明之源留下了创造和进步的印记。

浙江人民在与时俱进的历史轨迹上一路走来，秉承富于创造力的文化传统，这深深地融汇在一代代浙江人民的血液中，体现在浙江人民的行为上，也在浙江历史上的众多杰出人物身上得到充分展示。从大禹的因势利导、敬业治水，到勾践的卧薪尝胆、励精图治；从钱氏的保境安民、纳士归宋，到胡则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从岳飞、于谦的精忠报国、清白一生，到方孝孺、张苍水的刚正不阿、以身殉国；从沈括的博学多识、精研深究，到竺可桢的科学救国、求是一生；无论是陈亮、叶适的经世致用，还是黄宗羲的工商皆本；无论是王充、王阳明的批判、自觉，还是龚自珍、蔡元培的开明、开放，等等，都展示了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凝聚了浙江人民求真务实的创造精神。

代代相传的文化创造的作为和精神，从观念、态度、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上，孕育、形成和发展了渊源有自的浙江地域文化传统和与时俱进的浙江文化精神，她滋育着浙江的生命力、催生着浙江的凝聚力、激发着浙江的创造力、培植着浙江的竞争力，激励着浙江人民永不自满、永不停息，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不断地超越自我、创业奋进。

悠久深厚、意蕴丰富的浙江文化传统，是历史赐予我们的宝贵财富，也是我们开拓未来的丰富资源和不竭动力。党的十六大以来推进浙江新发展的实践，使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与国家实施改革开放大政方针相伴随的浙江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深层原因，就在于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文化传统与当今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就在于发展先进生产力与发展先进文化的有机结合。今后一个时期浙江

能否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继续走在前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文化力量的深刻认识、对发展先进文化的高度自觉和对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工作力度。我们应该看到，文化的力量最终可以转化为物质的力量，文化的软实力最终可以转化为经济的硬实力。文化要素是综合竞争力的核心要素，文化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文化素质是领导者和劳动者的首要素质。因此，研究浙江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增强文化软实力，为浙江的现代化建设服务，是浙江人民的共同事业，也是浙江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要使命和责任。

2005年7月召开的中共浙江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作出《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提出要从增强先进文化凝聚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增强社会公共服务能力入手，大力实施文明素质工程、文化精品工程、文化研究工程、文化保护工程、文化产业促进工程、文化阵地工程、文化传播工程、文化人才工程“八项工程”，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教育、科技、卫生、体育“四个强省”。作为文化建设“八项工程”之一的文化研究工程，其任务就是系统研究浙江文化的历史成就和当代发展，深入挖掘浙江文化底蕴、研究浙江现象、总结浙江经验、指导浙江未来的发展。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将重点研究“今、古、人、文”四个方面，即围绕浙江当代发展问题研究、浙江历史文化专题研究、浙江名人研究、浙江历史文献整理四大板块，开展系统研究，出版系列丛书。在研究内容上，深入挖掘浙江文化底蕴，系统梳理和分析浙江历史文化的内部结构、变化规律和地域特色，坚持和发展浙江精神；研究浙江文化与其他地域文化的异同，厘清浙江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和相互影响的关系；围绕浙江生动的当代实践，深入解读浙江现象，总结浙江经验，指导浙江发展。在研究力量上，通过课题组织、出版资助、重点研究基地建设、加强省内外大学名校合作、整合各地各部门力量等途径，形成上下联动、学界互动的整体合力。在成果运用上，注重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充分发挥其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作用。

我们希望通过实施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努力用浙江历史教育浙江人民、用浙江文化熏陶浙江人民、用浙江精神鼓舞浙江人民、用浙江经验引

领浙江人民，进一步激发浙江人民的无穷智慧和伟大创造能力，推动浙江实现又快又好地发展。

今天，我们踏着来自历史的河流，受着一方百姓的期许，理应负起使命，至诚奉献，让我们的文化绵延不绝，让我们的创造生生不息。

2006年5月30日于杭州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序

赵洪祝

浙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素称“文物之邦”，从史前文化到古代文明，从近代变革到当代发展，都为中华民族留下了众多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勤劳智慧的浙江人民历经千百年的传承与创新，在保留自身文化特质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外来文化的精华，形成了具有鲜明浙江特色、深厚历史底蕴、丰富思想内涵的地域文化，这是浙江人民共同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结晶，是中华文化中的一朵奇葩。如何更好地使这一文化瑰宝为我们所用、为时代服务，既是历史传承给我们的一项艰巨任务，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一项神圣使命。深入挖掘、整理、探究，不断丰富、发展、创新浙江地域文化，对于进一步充实浙江文化的内涵和拓展浙江文化的外延，进一步增强浙江文化的创新能力、整体实力、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发挥文化在促进浙江经济、政治和社会建设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历届浙江省委始终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早在1999年，浙江省委就提出了建设文化大省的目标；2000年，制定了《浙江省建设文化大省纲要》；2005年，作出了《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经过全省上下的共同努力，浙江文化大省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是浙江文化建设“八项工程”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迄今为止国内最大的地方文化研究项目之一。该工程旨在以浙江人文社会科学优势学科为基础，以浙江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理论、现实课题和浙江历史文化为研究重点，着重从“今、古、人、文”四个方面，梳理浙江文明的传承脉络，挖掘浙江文化的深厚底蕴，丰富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推出一批在研究浙江和宣传浙江方面具有重大学术影响和良好社会效益的学术成果，培养一支拥有高水平学科带头人的学术梯队，建设一批具有浙江特色的“当代浙江学术”品牌，进一步繁荣和发展哲

学社会科学，提升浙江的文化软实力，为浙江全面建设惠及全省人民的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正确的价值导向和有利的智力支持，为提升浙江文化影响力、丰富中华文化宝库作出贡献。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开展三年来，专家学者们潜心研究，善于思考，勇于创新，在浙江当代发展问题研究、浙江历史文化专题研究、浙江名人研究、浙江历史文献整理等诸多研究领域都取得了重要成果，已设立十余个系列400余项研究课题，完成230项课题研究，出版200余部学术专著，发表大量的学术论文，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这些阶段性成果，对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提供了新的支撑力和推动力。

党的十七大突出强调了加强文化建设、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极端重要性，并对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了全面部署。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浙江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并坚持把建设先进文化作为推进创业创新的重要支撑。2008年6月，省委召开工作会议，对兴起文化大省建设新高潮、推动浙江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进行专题部署，制定实施了《浙江省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纲要（2008—2012）》，明确提出：今后一个时期我省兴起文化大省建设新高潮、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主要任务是，在加快建设教育强省、科技强省、卫生强省、体育强省的同时，继续深入实施文明素质工程、文化精品工程、文化研究工程、文化保护工程、文化产业促进工程、文化阵地工程、文化传播工程、文化人才工程等文化建设“八项工程”，着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化产业发展体系“三大体系”，努力使我省文化发展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在文化建设方面继续走在前列。

当前，浙江文化建设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既面临千载难逢的机遇，也面对十分严峻的挑战。如何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始终保持浙江文化旺盛的生命力，更好地发挥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作用，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不断探索的重大新课题。我们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全面实施“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以更深刻的认识、更开阔的思路、更得力的措施，大力推进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努力回答浙江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遇到的各种新问题，努力回答干部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努力形成一批有较高学术价值和社会效益的研究成果。

继续推进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我们热切地期待有更多的优秀成果问世，以展示浙江文化的实力，增强浙江文化的竞争力，扩大浙江文化的影响力。

2008年9月10日于杭州

序

学术史在今天再度成为显学。这是因为，学术是一个社会的知识和观念的生产部门，社会文化体系的核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文化积累首先是学术的积累，文化建设和发展必须依托于学术的不断创新和推进。因此学术最能够内在地反映一个民族、一个区域、或某一历史时期文化发展的进程和程度，反映这个民族、区域或历史时期文化积累的厚度。清理这个民族、区域或时代的学术发展史，既是清理并总结这个民族、区域或时代的文化遗产，也是为总结这个民族、区域或时代的学术——文化发展的特点以及经验教训，并从中发现它的发展规律，为今天的文化建设服务。尤其是自上个世纪 80 年代以来，学术界面临着新一轮学术嬗变，文化和学术的发展越来越受到高度重视，因而“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即对中国学术发展的历史脉络进行再梳理，对学术发展的规律和经验教训进行再探讨的学术史研究，也就更显得有意义、也很有必要。

在整个中国学术史当中，在笔者看来，最为精彩、最值得关注的有三段：先秦时期、两宋时期、晚清时期。而本研究选择的是晚清时期。因为，伴随着政治大变革和文化大变革，中国学术也在晚清时期经历了脱旧入新的大变革过程，即传统学术（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经学）在欧风美雨、政治风潮的吹打下日渐走向没落，而近代学术在西学的启导下、在中国旧学术的土壤上产生，又在政治潮流的推动下发展壮大，并初步建立起现代学术体系的雏形。也就是说，中国现代学术是从晚清时期发生、发展过来的。晚清时期是中国学术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重要时期。

正因为如此，本书试图解答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学术是怎样从传统向近代转型，即中国现代学术是如何在摇摇欲坠的旧学术宫殿旁搭建起来的？

一

中国作为一个有数千年历史的文化古国、作为一个身躯庞大的文明体

系，其学术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型，是一个波及面相当广、演化相当复杂的过程，要准确地认识和描述这一过程，很有必要选择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区域进行深入的考察，通过对这个个案研究的具体而细致的考察和实证分析，发现并提供关于中国学术转型这一整体的过程、特征和规律的概括和认识。这个作为本研究之个案的区域就是浙江。

之所以作这样的选择，是由于笔者所看到的浙江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决定的。

从纵向，即从中国学术史这一历史过程说，浙江学术在中国学术史上，一直处于全国学术界的前列。可以说，那一个个辉煌历代学坛的浙籍学者，正是中国学术不断向前演进的一个个标杆。这在南宋以来最为明显——

宋代是中国学术范式重建的时期，其主要表现是义理之学取代了汉唐章句之学。在邵雍、周敦颐、程颢、程颐等将学术引向“心性义理”的探讨之同时，明州“杨杜五子”（杨适、杜醇、王致、王说、楼郁）讲贯经史，倡导有用之学，永嘉“儒志、经行二子”（王开祖、丁昌期）“倡为有用之学”，中国学术史上影响重大的浙东学派开始孕育。其后，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以杨简为代表的“四明学派”在两宋相继而起，形成了可与朱学鼎足而立、互相争鸣的“浙学”。也就是说，由“杨杜五子”以来的“浙学”，同程朱理学一样，标志着中国学术在两宋时期走向了一个高峰。

元代儒学的主要贡献是承南宋之旧，启明代之新。而元代浙江学术正是起了这样的作用，其中最著名的是与北方理学家许衡齐名、人称南北二许之一的许谦（1269—1337年，字益之，婺州人）及其所代表的北山学派。北山学派产生于南宋末年，号称理学正宗，在元代生存、发展了近百年，一脉相传至明初，产生了对明代有重大学术和思想影响的名儒宋濂、方孝孺。黄宗羲称誉他们是“有明之学祖”^①，这正是他们对明代学术先驱先路之贡献的写照。

明代学术至中期达到高峰，其标志是余姚人王阳明开创了“姚江学

^① 《师说·方正学孝孺》，黄宗羲著《明儒学案》，中华书局1985年点校本。

派”。这就是黄宗羲所说的有明学术“至姚江而始大明”。^①因为王阳明的姚江学派建立起一个庞大复杂的心学体系，不仅成为明朝的主流学说，也是古代东亚地区主观唯心主义哲学的最高峰，其影响超越了国界，以至王阳明被梁启超称为“千古大师”。^②

关于清代学术之前驱先路者，有说是“清初三大儒”（黄宗羲、孙奇逢、李颙），有说是“明清之际三大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但无论是哪一种说法，余姚人黄宗羲都在其中。黄宗羲的贡献就在于，他在学术上主张不为空疏无用之学，强调明经通史，提倡经世致用，开清代朴学之风，所以后代学人称誉黄宗羲为“清代朴学大师”之一。

大师们开创的朴学——汉学，在清代成为主流学派，它在浙江也是有名家。著名者如：被《清儒学案》著者称为“自明以来，申明汉儒之学，使人不敢以空言说经，实自西河始”^③的萧山人毛奇龄，博通诸经、开考证学之先声的秀水人朱彝尊，以考证伪书、治舆地之学知名的德清人胡渭，勇于疑古、开以疑古态度治经之先声的仁和人姚际恒（1647—1715年，字立方，号首源）。尤其是黄宗羲创始、经鄞县万斯同、万斯大、全祖望、余姚邵廷采、邵晋涵、会稽章学诚发扬光大的浙东史学派，更是成为乾嘉吴派、皖派之外的另一重要的朴学支派。

而当中国学术面临新旧交替、亦即中国学术亟须另寻出路之际，正是浙籍学者们为中国学术突破中世纪的樊篱、迎接近代曙光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嘉道之际，龚自珍等接过今文经学大旗，其意义不仅仅是借经言政、为迎接社会变革锻造思想武器，更是借经疑经、反经，使学术开始摆脱传统的羁绊而走向近代；与此同时，浙籍学者中的许宗彦、龚自珍、沈垚、徐松等人倡导实学研究，使学术走出经典、走出书斋，关注自然、社会和现实，从而开始向近代抵近；而以李善兰为代表的浙籍畴人，将传统的畴人之学推进到传统时代的最高水平，即抵达了近代的大门口，并以此为基础，成为近代科学的第一批“盗火者”，或曰第一批“播火者”；在进入近代以后，浙籍学者是西学引进和传播的主要力量，可以说，晚清时期浙籍学者对“西学”——近代学术的理解和汲取，是最早、最快的，

① 《姚江学案·序》，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中华书局1985年点校本。

② 梁启超：《复余姚评论社论邵二云学术》，《饮冰室合集·专集》四，第126页。

③ 徐世昌等纂：《清儒学案》卷二十五，西河学案。中国书店1990年影印本。

浙江的传统学术向近代学术转型、近代学术活动的开展、近代学术体系的建构等，都可谓为先进。浙江学术在晚清走过的路，相当完整地代表着中国学术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历程。而且，在建设近代学术的活动中，更是产生了多位引领中国学术的大师：王国维、章太炎、蔡元培……以及各学术领域的学科创始人、或带头人：沈曾植、陈虬、陈黻宸、夏曾佑、罗振玉、杜亚泉、钟观光、李叔同、马叙伦、周树人、章鸿钊、俞同奎、何育杰……这些从浙江升起的巨星，辉耀了整个中国的学术界，也是中国近代学术不断向前发展的一个个标志性的人物。

从横向说，浙江学术在历代中国学术界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浙江自古号称“文物之邦”、“人文渊薮”，其重要表现是学术研究发达。随着北宋以后全国经济重心南移，文化与学术的重心也开始转移到两浙等东南地区，自此，浙江学术获得了越来越快的发展，并且在全国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从本书第一章的各统计表和文字叙述可看到，从南宋到清代，浙江在传统学术领域始终居于全国的前列：从学派数量说，以浙籍学者为案主的学术流派数量及其在全国所占的比例，南宋时为40.81%，元代为16.67%，在明代为23.81%，在清代为22.67%。这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浙江学术在中国学术创新史上的巨大贡献，以及浙江学术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引领作用。而著名学者——即被收入各种学案的学者人数，始终占全国的20%—39%之间。也就是说，浙江学术在全国学术体系中所占的份额一直在1/5到1/3之间。进入近代，浙籍学者在引进西学的学术活动中同样也是一支重要力量，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时期，翻译馆1868年正式开馆后，参加翻译馆翻译或笔述工作的中国学者共有48人，其中浙籍学者有10人，占20.83%。翻译馆从正式开馆到1912年间共译书有241种，其中浙籍学者的译书共有69种，占28.63%。清末的中国社会日趋开放，日趋开通，区域间的文化差距渐渐缩小，因此在近代学术成果中，浙籍学者在其中所占的比例略有降低，但仍占有很重要地位。根据顾燮光的《译书经眼录》统计，该书收录1902—1904年中国学者的译书共535种，其中浙籍学者译书为93种，占17.38%。该书第八卷为“本国人辑著书”，即中国学者辑著的新学书籍，共619种，其中浙籍学者所辑著的新学书籍为118种，占19.06%。这一比例——浙江学术在整个中国学术中的重要地位一直保持到现代。据2007年的统计，中国科学院共有院士735人，其中浙籍院士为114人，占15.51%。中国工程院共有院士

695人，其中浙籍院士为116人，占16.69%。^①也就是说，浙江学者的学术研究活动不仅在中国传统学术史中所占的份额非常突出，在中国近代学术体系中，其重要地位也基本未变。

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浙江学术史清楚叙述和分析，是中国学术史主线索、特点和规律的更清晰、更实证的再现。

二

笔者在这里反复强调浙江学术在传统、在近代学术体系及其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不仅仅是要标显浙江学术在历史上的贡献，如前所述，这是为了更清晰、更实证地再现中国学术发展史的主线索、特点和规律。而对于中国学术从传统向近代转型这一历史过程的研究来说，浙江学术史的典型意义更为明显。因为浙江学术在清代的发展历程，的确是清晰、具体而实证地映射出中国学术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路途。

从浙江学术史看，中国学术的近代转型、或曰变革过程，在清代即已开始。亦即从清代中期到20世纪初，经历了中国近代学术产生、发展和建立体系的过程。这一转型过程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中国传统学术动荡、分化、重新组合，以及孕育新因素的时期。这一阶段开始于清代中期。

清代中期以后，宋以来的传统学术的历史循环圈——每当新旧朝代更替之际，或者王朝统治力衰颓之时，在学坛势力最大的往往都是程朱理学，到清末终于没能画圆，亦即程朱理学在清末（至少是在浙江）并没有像以往那样再次复兴，没有多少学者愿意为之摇旗鼓噪。从徐世昌编纂的《清儒学案》上看，浙江研究程朱理学的著名学者清初有近50人，至乾嘉或嘉道时期剧降至2人或3人，并且此后再也没有出现过“中兴”。无论是在所谓的“盛世”，还是在亟须学术“拯溺救焚”的衰世，那些厌倦“虚理”、“腐理”的学者们并不是根据庙堂上的位置排列去崇拜程朱，而是从虚、实之辨别的角度选择了讲求实证的汉学，这本身就是传统学术衰败的一个表征。于是，汉学在乾嘉时期的浙江达到了最鼎盛的巅峰，即

^① 张刚等：《另类视角话院士》，载《科学中国人》2007年第7期。注：该卷的“报章”部分未计入。

梁启超所形容的“如日中天”。

而所谓最鼎盛或“如日中天”的另一面，亦即这条经学之路到乾嘉时期实际上已经走到了尽头。因为汉学的治学方式单一死板，研究范围拘泥狭隘，琐碎短钉，只求“博古”而缺乏治学的目的性，只向古经典讨生活而远离实际。说明经典的资源已经被掘尽而枯竭，经学的学术内容与学术方式都已丧失了生命力，传统学术的分化也就势在必然。

所谓分化，亦即学者们纷纷离开原有的学术基点，各奔东西，在已发生变化的新社会内容的基础上、或曰在新的文化氛围之下往前探索出路，以学术不断更新的方式日渐远离原有的学术基点——疏离传统。

首先是经学内部的分化。继经学内部学者们纷纷崇汉弃宋后，汉学内部在乾嘉以后也出现了裂缝，无论是学风上还是治学内容上，都呈现出多路径、多色彩、各奔东西的现象，也可以说是分崩离析之象，而且其裂缝不断扩大：成为汉学阵营之成员的浙东史学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特色，且越来越表现出与主流经学若即若离的态势；吴派虽在浙江兴起，却始终遭冷遇，至乾嘉年间略有活力的皖派勃然兴起，成为汉学的主流；但至嘉道以后学者们越来越不满于学术研究中的理论缺位，急欲寻求新“义理”，不仅“汉宋兼采”之呼声渐起，更有龚自珍等人借公羊学派的“微言大义”手法阐发出批判传统的思想理论，俞樾从经典中阐发出适于时务、赞成“官天下”批判“家天下”^①、称“克己复礼”并非“克去己私”^②这类新“义理”，孙诒让从经典中发掘出具有新的时代气息、新的政治内容的君不自私、民可参政的“治道”。^③这些汉学家们虽然仍耙梳于经典，但已表现出了与传统渐行渐远的趋势。

而当经学的神圣性、严肃性色彩被一点一点地刮去，经学在学坛唯我独尊的地位也一点一点地流失，分化就不仅仅是经学，而是整个传统学术体系了。自乾嘉以后，学者们越来越失去对经学研究的兴趣和严肃认真的态度，东奔西突，纷纷向东汉经学以外以至向经学以外寻求学术的新出路，促使学术领域在旧的分化之后继以重新整合——学者因越来越不耐烦于日显呆滞褊狭、沉闷烦琐的考据与训诂学，纷纷移情于经典以外的学

① 俞樾：《湖楼笔谈》卷二《春在堂全书·第一楼丛书》，光绪二十三年重订本。

② 俞樾：《与笏山方伯》，《春在堂全书·春在堂尺牍》，光绪二十三年重订本。

③ 孙诒让：《周礼正义序》，《周礼正义》卷首。